

'94 海南 社会经济发展研究

主 编 廖 逊
执行主编 邹良贤

海南省政府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南海出版公司

琼新登字 01 号

'94 海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

主 编 廖 逊
执行主编 邹良贤

责任编辑 张爱国 耶白堤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海南农垦报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23 印张 540 千字
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 7—5442—0487—1/F·35

定价:15.00 元

敬业,乐业,勤业

——序《'94 海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

廖 逊

刚刚过去的 1994 年,是我们海南省人民政府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的一年。用我们的老主任符大榜同志的话来讲,叫作“人比过去少了,成果反倒比过去多了。”这句话对于我们 1994 年的工作,无疑是一个最简明扼要,也是最恰如其份的概括。

一、怎样看待 1994 年的海南经济形势

每到经济发展的战略转折关头,对形势的歧见就特别多。在回顾总结 1994 年工作之时,我们也不能不首先讨论这一年研究工作的外部环境。

1994 年国家宏观调控力度继续加大,海南的“房地产热”进一步退烧降温,“狂飚突进”式的资本原始积累,终于结束了。由于在 1992、1993 年的经济繁荣中,房地产业和与其密切相关的金融业,起了带动作用,如今房地产一退热,股势也随之低落,整个第三产业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加上海南的工作基础薄弱,银行信贷一紧就起伏不定,所以人们对整个海南经济形势的看法,也就远不那么一致。

目前我省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以我们研究中心邹良贤同志为代表,认为海南 1994 年的经济,是正常、健康、速度

也是比较快的发展；而另一种观点则以某些兄弟单位有关研究人员为代表，认为海南 1994 年的经济，是不正常、不健康、速度也是很慢的发展。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邹良贤同志的观点同另外那些同志的观点各有千秋，只是他们观察问题的视角不同，他们是从不同的方向接近了客观现实。对此我本人所要补充的是，他们不同的视角来自不同的出发点：邹良贤同志是从海南经济发展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而与他观点相反的同志，则是从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暂时利益出发。仅仅由于是从这两种不同的出发点来观察形势，才有可能形成同样合乎逻辑，同样真实地反映了客观现实，而又大相径庭的结论。

我们海南与其它兄弟特区最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是全国唯一的以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太特区”。正因为如此，在讨论经济形势时，假如我们脱离了六百万农村人口的切身感受，就会脱离群众。多年来，分管少数民族工作和农村工作的省级领导同志，一再提醒我们不要脱离少数民族，不要脱离农民群众，要“站在五指山看海南”，就是这个意思。

据有关部门预计，1994 年我省农业增加值可望达到 94 亿元（现行价），比 1993 年增加 16.42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10.3%，不仅保持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而且使农民人均收入达到创纪录的 1,361 元，比上年增加 345 元，增长幅度高达 37%。这两项指标都大大超过了省政府在去年年初确定的目标。去年 12 月我省商品价格指数为上年 116%，足见 37% 的收入增长当中，至少有 21 个百分点是实实在在的。难怪无论是在广大农村，还是在农垦系统，人们都普遍认为 1994 年是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日子最好的一年。

经济特区的功能就是吸引外资，衡量招商引资的好坏，不仅要与上年相比增长的快慢，而且还特别要看与国际资本流

向相比,发展态势的好坏。据美国国际金融研究所 1994 年 12 月提供的数字,90 年以来,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不断增长,到 1993 年达到 2051 亿美元这个最高点,此后逐年下降。预计 1994 年降到 1771 亿美元,1995 年还要下降到 1500 亿美元。而就我们目前掌握的数字,1993 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为 260 亿美元,1994 年预计增长到 300 亿美元以上。海南 1993 年实际利用外资 9.72 亿美元,1994 年预计增长到 12.4 亿美元。换言之,在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减少 14% 的 1994 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反而增长 15% 以上,海南实际利用外资增长得更多,增幅在 28% 以上。可见“特区不‘特’,外资不来”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与引进外资直接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去年年初我在一次电视讲话中预言,1994 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为 200 亿元以上,省内有些同行公开质疑。如今有关方面的预计至少在 200 亿元以上,又有些朋友声称,这个数字与他们的主观感受不同,怀疑是“浮夸风”。对于目前这套统计办法,我也持有不少保留意见。然而它至少具有可比性,因为历来都是采用这套办法的。我们不能仅仅依据自己的主观感觉就表示怀疑。再者,这些朋友在 1992、1993 年时,为什么就表示不怀疑呢?难道那两年的统计就那么准确吗? 1994 年上半年海南的基本建设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 75%,能源工业投资增长 220%,交通通讯投资增长 170%,技术改造投资增长 110%。下半年的统计虽然尚未正式公布,但估计也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就在 1994 年,南山电厂、大广坝水电站、通讯工程、凤凰国际机场和南大立交桥等一系列重大的基础设施项目相继建成,东干线高速公路的建设也进入最后阶段。如此众多的大项目,在一年之内密集建成,为历年来所仅见,尤其是后面三个大项目,人人有目共睹,怎么能说看不见、感受不到呢?

再有就是物价。海南历年来的物价上涨水平，均高居全国之冠，1988年甚至达到44%。直到1994年1月，还位居全国之首。然而到了11月和12月，已经下降到全国第26位。它的下降绝非偶然，而是因为在1992年就基本上完成了价格体系的改革。我们已经在过去两年，消化了物价改革必然要带来的涨价因素，使价格总水平进入回落阶段。这与内地许多省份靠价格管制来降低物价相比，具有本质的不同。

大家知道，中共中央12月经济工作会议，把物价问题和农业问题，视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最突出问题，而我们海南偏偏就是1994年，在上述两个方面都有良好的表现。这至少说明，我们海南的经济形势，不像有些朋友感受得那么“严峻”。还是邹良贤同志说得对：“在全国宏观调控，经济环境偏紧的情况下，1994年我省经济增长幅度仍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准，经济领域的一些重要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表明经济运行是正常、健康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1994年在90年代海南经济发展史上具有战略转折性质的重要地位，它挽救了海南的实业投资环境，结束了“房产一业兴旺，百业萧条”的局面，大陆城乡消费者对海南农产品和旅游资源需求的急剧扩张，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海南经济特区的对外开放，必须是“背靠大陆，面向世界”，而非不顾条件的“越开放越好”。

此外，1994年各产业之间投资回报率的平均化趋势，直接减缓了“下海”大潮对我们研究部门的冲击，使我们在这一年站稳了脚跟，而埋头学问的同志们，更是大放异彩。

二、新形势下研究工作的改善

1994年海南经济工作的改善完成了历史性的转折，从以

“房地产热”加速资本原始积累，转向以实业开发带动百业兴旺。这一变化，又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崭新的要求。

首先，它要求我们开阔视野，加强对国际国内资本走势的研究。

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洛林教授，在“全国经济特区比较研讨会”上，对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特区的研究工作者，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他认为我们对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的研究不够，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研究不够。这的确是一个通病，对于我们海南来说，尤其不应该。因为别的特区，都是省管辖之下的城市特区，长期以来习惯了在本省范围之内思考问题，研究同省内非特区相比，这项政策或那项政策特不特。它同中央隔着一个省，所以对国家宏观经济形势一般不那么关心，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分析研究当然就更谈不上了。除了深圳的香港研究、珠海的澳门研究、厦门的台湾研究，情况好一些之外，就是对兄弟特区和开发区搞一些研究。我们海南的研究人员，就没有这个借口。

王洛林教授的提醒，是非常宝贵、非常及时的。因为经济特区搞的是外向型经济，是主要依靠区外和国外资本，进行超常规开发的地区。研究国内资本和国际资本的流向，理应成为我们研究工作的一大重点。例如，1994年我省橡胶种植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其主要原因并非如某些同志所言，是由于所谓“上级的英明领导和广大群众的冲天干劲”，而是由于一方面美国汽车工业的强劲复苏，大举抢购南洋天然橡胶，使胶价从1月份的每吨800美元，猛增到12月的每吨1510美元；另一方面，传统的橡胶产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非但没有增加橡胶生产，反而继续了前几年的减产政策。因为橡胶种植业是一种适合低收入地区干的行业，工资高了成本太高，工资低了没人干，而上述三国的经济均处在高速发展时期，其中

的马来西亚和泰国已经极大地接近了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水平。它们那里百业兴旺，工资总水平不断提高，因而从供给方面，也进一步提高了胶价的攀升。面在我国国内，1994年推出了“五大改革”，汇率并轨之后，用户已经失去了以平价外汇购买橡胶的优惠照顾，国家橡胶非但没有抛出库存，平抑胶价，反而大举收购。这就使得天然橡胶的种植者大受其益。对于种植着全国75%的天然橡胶的海南来说，真是喜从天降。令人汗颜无地的是，包括我们研究中心在内所有的省内科研机构，都只当了“事后诸葛亮”。这固然要比那些连“事后诸葛亮”都没当上的人强一些，但毕竟没有起好决策咨询者应起的作用。严格说来，这也叫“不称职”。天然橡胶仅仅是一个具体例子，它说明了多方的问题。当前，我们应特别注意国际资本的流向问题，1994年美国联邦储备一连六次提高了利率，从最近的墨西哥货币危机来看，还可能继续上调，这将对发展中国家的招商引资工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它将要求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或调整招商策略？至今还没有人认真研究。我们有许多同志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个问题，只是因为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尚束手无策。

因此，我们必须改造信息手段。1994年，当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到“信息高速公路”这个概念之时，当海南的许多企业，都大大加强在信息方面的资金投入之时，我们产业处的同志们，就乘势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我和符大榜同志都认为，这件工作的意义是具有革命性的。没有信息手段的技术革命，我们的研究工作就不可能上档次，上水平。在这里，我想起1月23日《海南日报》上，刊登过一条消息，说“墨西哥外资引进成绩斐然”。据我所知，这是新华社12月20日发出的一篇著名文章上摘下来的。不幸的是，就在这个电讯播发的当天，墨西哥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货币危机，比索与美元汇价贬值60%，如

果不是美国及时提供数以百亿计的贷款担保，墨西哥比索的信誉早就彻底垮了。如今世界各地都在从中总结经验教训，而我们的报纸还在登刊这种隔日黄花。有些朋友一写到国际形势，就喜欢摘抄报纸，用这样的信息去咨询决策，岂不是要误大事？

当然，信息的搜集也并非仅仅是电脑。图书和报刊也是很重要的载体。一些必要的报刊，我们经济再困难也要订阅，否则我们的研究工作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信息学者把信息的范围概括得很广，并不仅仅局限在最新动态上，一切载体都承接信息。包括一切学科的经典学著作、百科全书、经史子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想出一流的成果，我们的研究人员就应当舍得下本钱。海南文化落后，每当我们到大陆出差，特别是到北京、上海出差，都是搜集图书的大好时机。要想吃好工作这碗饭，就非得下这个本钱不可。不过从单位来讲，普及电脑知识仍然是主要的，希望我们的电脑工程师马海东同志，1995年能够在这方而有所贡献。具体采取什么形式，还要进一步研究。

谈到之里，我已经进入了第二个方面的任务，那就是改造我们的知识结构。

我们的研究人员，几乎全部毕业于计划经济时代。而且直到今天，大专院校里的教学课程设置和教科书的编写，也远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时期的要求。这就说明，我们从学校里学到的那些知识当中，至少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些陈旧的、过时的知识，有些科目与现代意义的社会科学相去甚远。我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过，决定我们的研究人员是否称职的标志，不是你在学校里学到了些什么，而是你能对老师给你的东西消化和批判些什么。当时在场的一些老教授很不高兴，而我至今认为，这是痛苦的真理，我不敢不坚持。

其中的道理，说穿了也非常简单，那就是因为当时许多学

科的理论体系千头万绪，归根结底都在服务于一个中心目标，那就是阶级斗争——“造反有理”，或“领导一切”，而我们今天的中心目标却是“发展生产力”。在革命年代，各种社会矛盾已经激化到非革命不可，非革命不能发展生产力的地步，离开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中心，当然就什么事情都干不成。然而今天的历史条件变了。在学习中共“十四大”，以及此后历次中央全会公报的时候，我们都发现中央提出的新观点，新思想，都同我们的大学教科书，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要想适应今天的研究工作，绝对不是一个在原有理论框架之内修修补补，就能对付得了的问题，而是结构性的更新。因为理论的功用，是指导实践。

几年前，我有幸翻阅过一批文科院校的教科书，对照十几年前的同类材料，深感内容变化之大，变化之快，然而几乎没有一个学科的好学深思之士对当时的教科书满意，他们都承认那只是过渡性的成果，不仅落后于实践，而且落后于国外同类产品。如今我们又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少学科教程又要更新改造，更是不言自明之理。毫无疑问，我们正处在一个全面变革的年代，而且这个变革才刚刚开始。生活在这样的年代，一切都只有不停地读书，不停地工作，“夜夜读新书，天天换新人”，才有可能在本专业内不讲外行话，不出样相。近两年来，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教科书又纷纷问世，我粗粗地浏览了几本，不禁大失所望，因为许多作者不过是穿靴戴帽，把从前政治经济学的有关原理又包装了一番而已。光读这样的书，只能是误人子弟。必须在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前提下，大胆引进现代经济科学的先进方法。我主张直接读萨缪尔森《经济学》，凡是做经济研究工作的同志都要读，即使是当年读过西方经济学选修课的同志，也要重新读。这本书其实不过是美国大学一年级的教材。1992年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的新

译本，已经是该书1985年出的第12版。自西方经济学问世以来，能够独领风骚几十年的教科书，前前后后不过三本；第一本是英国人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流行于1848年到1890年；第二本是英国人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流行于189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人萨缪尔森这一本是第三本，自1848年以来流行于世，时至今日尚无其它著作可以取代。该书文笔生动，深入浅出，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其最可宝贵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对于具有较为系统的经济学知识的读者，此书提纲挈领、纲举目张，可备为案头工具；对于初学的读者，此书又可权充导向型工具书，由此一举摸清经济学宝库的门牌号数，然后按图索骥。当然，科学无顶峰，世界上一定会有第四本、第五本、第六本权威教科书问世，只要在我们有生之年，就一定要读，非如此不能跟上时代。

只有把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搞清楚了，才有可能正确分析和利用信息资料。我们经常发现这样一些作者，掌握的材料很多，写起东西来洋洋洒洒，浩浩荡荡，但就是不得要领，不能从中看出一套系统的思维逻辑，套用句“文革”语言，叫作“没有统帅，没有灵魂”。还有一些作者，道理总是讲得不深不透，甚至花费许多笔墨，去讲述经济学里本来早就有过精确表达的道理。这里我们姑且还不去计较那些根本不懂经济学原理的、不入流的文章。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我们必须尽快掌握现代经济科学的基本理论，掌握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非如此谈不上知识结构性的更新。

请注意，我在这里讲的仅仅是经济学一个学科的知识更新，因为经济工作是“中心”。其它学科也有它们各自的现代科学体系，也有其集大成的代表作，需要认真研读。在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不能墨守过去的教科书。

改善我们研究工作需要努力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要积极参

与大众传播。

在这方面，这些年来我们已经有过不少有益的尝试。我们参与大众传播的宗旨，是为了沟通，因为我们的国家，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需要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同情和相互支持。改革是一场革命，但又不同于以往那些革命，因为人人都是改革的动力，人人又都是改革的对象；人人都对官僚主义切齿痛恨，但人人又都情不自禁地在自己的权限范围之内，多多少少地搞一些官僚主义。在这样的改革中，大家更应当互相沟通，互相帮助。

研究人员参与大众传播，不仅有利于让公众了解情况“是什么”，而且有利于让公众了解情况“为什么”。我们绝对不是向公众简单地发布个消息，而是要向公众深入浅出地分析事态的发展，讲明其中的道理，提供某些预测和前瞻。这样的传播，自然要比一般政府管员的新闻发布，难度大得多。

大众传播的方式很多，我们研究中心1994年在各类报刊上发表了267篇报告和文章，出版了《海南年鉴》、6期《海南与世界》、4期《开放与开发》和6本专著，都属于大众传播性质。不过我在这里所要强调的还不是这一类，而是利用广播电视手段进行的传播。因为报刊和出版物的读者，在这个社会上毕竟只是少数人。

过去有一种说法，叫作“要出名，靠电台”，后来又有了“要出名，上电视台”的说法。然而无论是电台还是电视台，都是一把两面刃，既可以帮助你“一举成名”，又能使你的盛名“毁于一旦”，因为它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们研究中心的同志1994年在各种会议上，做了108场报告讲演，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经验，无论我们准备得是否充分、讲得是否动听、听众一般都不会站起来就走，但广播电视则不然。人家只要两三句听得无趣，就要转到别的频率或频道去。所以，

讲演人必须保证时时刻刻都能“抓得住人”，没有什么“起、承、转、合”的回旋余地。其中电视还要苛刻一些，不仅与广播一样看不到听众，不能观颜察色、调整表演分寸，而且还得把自己的讲演形象，单方面地公诸于众，听任社会各界观众“横挑鼻子竖挑眼”。

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苦练大众传播的基本功。当然在另一方面，通过广播电视进行的大众传播还有一个特殊的优点，那就是劳动者的成果不容易受剽窃，谁讲的就是谁讲的，玩不成“换头术”。我们研究中心有一个好传统，就是保护知识产权，鼓励个人奋斗，不像有的单位那样，上广播上电视只许少数领导出头露面，不准其他人“越俎”，只要人家电台、电视台欢迎，有利于收听率收视率提高，我们就支持，从中心领导这一方面来讲，是开放的。因为我们深知，只有在平等竞争的环境里，优秀人物才会脱颖而出。

总而言之，更新信息手段、更新知识结构、积极参与大众传播，是我们在1994年里已经开始的三项措施，也是我们在1995年将要大力抓紧的工作。它们好比一个企业的供、产、销。通过对上述三个环节的改造，使我们的研究工作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三、我们需要宏扬什么样的职业道德

我前而所说的，只是具体的方法。凡是这几年在海南工作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都知道，当前我们而临的是大问题并非方法或技术手段的问题，而是职业道德的危机，时代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不是“不该怎么样？”而是“应该怎么样？”我们一贯主张，研究工作应当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客观中立。不过此刻要谈的还不是这些。

受北京一次学术研讨会的启发，我想把我们应当宏扬的职业道德，概括为“敬业、乐业、勤业”。这并不是我个人的发明，而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

“敬业”一词，出自《礼记·学记》中的“敬业乐群”即专心学业，乐与朋友相切磋之意。朱子有云：“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也。”后人又从“敬业”的字而上，引伸出了尊重和珍惜本职工作之意。这当然也讲得通。我们今天，就是要提倡这种敬重本业，视若神明的精神。没有事业自豪感，什么事都干不成。

由于我们的决策咨询研究工作，是提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以来的一个新生事物，特别是在海南这个贫困落后地区，人们尤为生疏，经常有人问：“你们研究中心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之所以要主张大力参与大众传播，沟通官民各界，其中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增强各级政府与社会各界，对我们的理解。然而我们有些同志非但自己不安于位，看不起这个无权无势的“清水衙门”，还处处发泄个人的不健康情绪，也去参加“研究无用”的“合唱”，这就很成问题了。他哪里知道，自尊者人尊，自贱者人贱。你越是发牢骚、讲怪话，就越是说明你上不近领导，下不靠院校，“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社会上就越是看不起你。

我们首先必须充分认识到我们工作的重要意义，认识到我们国家和社会在改革开放、探索前进道路的年代，多方需要一批大公无私的饱学之士，不是站在某一个衙门、某一个财团、某一个阶层、某一个小集团的本位利益，而是站在全社会的立场上进行深入研究，才可能使政府与社会各方面的决策人，提供宝贵的咨询。有了这个认识，就不会津津乐道于“后院争宠”，或者“领导不重视”而悲悲成成，自惜自怜。我们是自尊自强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我们坚信自己的工作，一定能赢得各级政府 and 全社会的尊重。这一切，取决于我们自身的不懈努力。而

这个“敬业精神”的具体表现，就是不计潮流所向，不受各种利诱，专心致志，精益求精，非此不能妄称“敬业”。

“乐业”一词，不知道是不是与《礼记·主制》中的“乐事劝功”有关，意思是乐于从事所业，努力获得成效。《晏子春秋》和《史记》上均有“乐业”一词，同我们今人从字面上的理解相似。

真正“敬业”的人，必然要达到“乐业”的境界。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所谓“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其中的第二境，就是宋人柳永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也就是说，敬业要达到乐此不疲的地步。经常有同志问我，你在灯红酒绿、人欲横流的“大特区”终日埋头治学，乐在何处？他们就不懂得学人的乐趣。只有全身心投入学问的人，才能够打破时空的桎梏，使精神遨游于古今的上下浩瀚世界。一个行政首长同样也可以搞些调查研究，他们只要找到有效的对策，就可以“班师回朝”了。而研究人员则不然，他首先要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把古往今来所有遇到同类问题的人，都尽可能地研究一遍，从他们的成败得失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研究他们身处的环境与今天的异同。等到对策形成，并被决策人付诸实施之后，还要追踪调查，继续思考，一直到这个问题不再成为问题。不这样做，研究人员就枉为“智囊”，你对某个问题要是懂得比省长还少，你能有什么发言权呢？而这种观察与思考，本身就充满了创造性劳动特有的乐趣。一方面研究人员比别人更能体验到，身为茫茫宇宙中一粒尘埃之渺小，又比别人更能体验到从事创造性劳动时，对人生价值最充分的肯定自我。这本身就是一种智慧上的优越。

研究人员披览古今，搜寻信息，从中提炼出观点，提炼出思想，其中的妙趣更是别人难以企及。工作和休息、劳思和娱情、求知和益智，统统熔于一炉，因此可以最长时间地持续工

作。《吕氏春秋》上有“敬时爱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之说，而支撑这一切的，恰恰是出自审美观的一个“乐”字。非此不能妄称“乐业”。

“勤业”一词，恐怕来自唐人韩愈《进学解》中的“业精于勤荒于嬉”。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有“业患不精，无患有司之明；行患不成，无患有司之不公”。学业唯恐不精进德行唯恐无成就，至于上级了解不了解，公正不公正，都无所谓。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就必须勤业。对事业敬也不敬，乐也不乐，检验的标准恰恰是勤也不勤。比方说，我们都自称爱吃西瓜，尚不能解决谁比谁更爱吃的问题，经济学家的检验办法，就是看谁肯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样一来，那个七角钱一斤就嫌贵的人就被淘汰了，那个一块五一斤还愿意买的人就被承认了。

大凡创造性的劳动，都有一个“出力长力”的特点。一方面而干出了成绩，另一方面增长了本事。干了许多年还干不出成绩，练不出本事的人，恐怕为数不多。有一位已经“下海”面去的同志曾经对我说：“我不能和你比，你是名人，写的东西有人要，我写一篇被报刊退回来一篇。”报社和杂志社为什么喜欢名人的稿子呢？是因为名人的稿子更能吸引读者，这无可厚非。这说明我们必须努力成名成家。不仅报社、杂志社希望你成名成家，研究中心更希望你成名成家，人才辈出，群星灿烂，是一个学术机构繁荣的首要标志。但是在今日中国，海南是报刊杂志按人口计算最多最密的地方，由于“下海”大潮的侵袭，又是文人最不安心的地方，假如在海南你都写一篇退一篇，说明你的才能不在我们这一行上，你确实该改行了。这个同志听了我的劝告，就“下海”去了。

我们单位的同志，大多比较年轻，要抓紧时间练几招硬功夫。最近洋浦开发区管理局提出，要求全体公务员在两年之内，人人掌握一门外国语，人人学会使用电脑，气魄比我们大多了。

因为学会这两样，都是要投入大量时间的。增长才干的快慢，也是勤业与否的标志。懒惰消蚀才华，能使天才的种子变作一事无成的空谈家。

我常想，中国的文圣人有孔夫子，武圣人有关帝，连木匠师傅都有鲁班爷作圣人。干我们这一行的，也应树立我们的楷模和榜样。远的不讲、仅在本世纪之内，中国就不知道出了多少了不起的大学者、大专家。

近几年来人们喜欢讨论市场经济下的文化人问题，甚至还有些人把我们海南、广东这一带的文化人“下海”、文化人“半下海”，视为南方知识分子的光荣标志。这真是天大的误会。在这里我只想提两位老前辈，一位是胡愈之，一位是邓拓，他们都是在市场经济下练成的一身本事。

胡愈之基本上是自学成才，通四、五门外语，出任新加坡《南洋商报》和《南侨日报》主编时，每周写四、五篇社论，有时因为忙于革命工作，就从会场上用电话即兴口授社论，再回来改清样，几个小时以后报纸就印好送到读者的早餐桌上。去年10月访新加坡时，发现那里有许许多多的老报人老学者，至今对胡愈之赞口不绝。

邓拓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在中原抗日反扫荡战场上随军办报，只要停止行军24小时就保证出报一份，相当多的文章是在战马上构思的。解放后出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通常晚上十点在周总理那里开了会，回来就开始定社论。写完一页就打印一页，最后一页刚写完，打印稿就送来了，再改第二稿。

我们的同志，就是要练就胡愈之和邓拓这样的硬功夫。神枪手都是用子弹喂出来的。为什么现在胡愈之和邓拓这样的人才少得可怜？就是因为搞了计划经济，搞了“大锅饭”，一家报社养好几百人，一个记者每个月上不去三、五篇文章。如今海